



试论《左传》节制观念与审美意识发展*

郭院林

摘要:《左传》于诸经中最为宏富。以往学界对《左传》的研究多注重考证史实、名物制度及其中反映的礼学思想,然而作为社会史,其中必然透视出当时人的思想观念。透过纷繁复杂的史实,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左传》所倡导的“节制”的生活观念,主要表现在日常起居、婚丧嫁娶、乐舞祭祀等方面。在《左传》作者看来,当政者节俭的生活方式为国家振兴提供基础保障;不加克制,外物与身份不相匹配的生活方式于己于国皆有害。《左传》节制的生活观念不完全是对历史思想观念的接受,而是在急剧变化的时局中做出的修正与调适,时代发展、社会需求与以历史为鉴戒密不可分。节制观念为孔子推扬,发展出“克己复礼为仁”“美善合一”“文质彬彬”“礼乐中和”等诸多美学命题,奠定了后世儒家美学的原则。

关键词:《左传》;节制观念;礼学思想;中和思想;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6-0057-07

《左传》于诸经中内容最为宏富,由此可探究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诸问题。学界对于《左传》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主要集中在经学、史学与文学领域,多注重考证史实、名物制度及其中反映的礼学思想,但对其美学的研究成果有限^①。其原因可能与《左传》以记事为主的主体性有关,所以后代学者指责左氏于义理的不足;而美学观念的成熟与表达要到人类历史发展成熟的晚期,相比而言,《左传》文本形成则早于这一时期。审美意识不同于审美观念:审美意识所包蕴的内涵更加丰富、产生的时间更早;而审美观念作为较系统的理论形态,直到春秋战国才开始出现。《左传》中没有明确表达美学的标准与观念,但其中行为内容与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却可以引导我们思考时人的审美观念,我们常说的“中和”之美在其中有所体现,那就是节制的生活方式。所谓“节制”,可以理解为节俭而守制,是内在修养约束与外

在法度要求的统一。《左传》反映的这一观念甚至成为民族精神,其具体内容如何?又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确有必要考察。

一、《左传》中“节制”现象分析

《左传》中表示“约束”含义的词有“节”“俭”“克”“幅”“要”等。在相关语境中,“节”“俭”二字各出现了10次和9次;“制”与“度”的使用频率更高,共约60次。可见“节制”的确是《左传》的思想倾向之一,它反映了日常起居、婚丧嫁娶、乐舞祭祀等各种行为。

在《左传》作者看来,当政者节俭的生活方式为国家振兴提供基础保障。卫懿公为狄人所杀,卫国濒临灭亡,“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1]273}。“大布”即粗布,“大帛”即大白冠,是古代的布冠。

收稿日期:2025-03-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整理”(19FTQB007)。

作者简介:郭院林,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扬州 225009),主要从事先秦文献、文学研究。

卫文公衣着朴素、选贤任能、鼓励生产,用勤俭之策使卫国重新恢复元气。这样的叙述方式会引导读者得出节俭的生活方式与选贤任能、重视生产等国家大政方针一样重要的结论。《左传》中对閔庐的书写,系统且直接阐述了节俭的生活方式将国家推向兴盛。“昔閔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形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1]1608-1609}吴王閔庐不以虚饰为美,举止有度,与百姓同甘共苦,最终雄霸南方。

与节俭形成对比的是不加克制,外物与身份不相匹配的生活方式于己于国皆有害。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郑子华之弟子臧好聚鶡冠,结果被郑伯派人杀害,原因在于:“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诗》曰:‘彼己之子,不称其服。’子臧之服,不称也夫!《诗》曰‘自诒伊戚’,其子臧之谓矣。”^{[1]427}外物与身份相匹配被视为节制,否则就是“不衷”“不称”,这会带来灾难。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齐国大夫庆封驾着华丽的车前来投奔鲁国。鲁国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则嗤之以鼻:“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1]1127}“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1]1149}这种谶语式的评价体现了时人的审美倾向,即车辆的纹饰如若超出了限度,过于华丽而与身份不相配,就不能引起人们的审美愉悦。庆封作为臣子器用奢靡、嗜酒好田、劳民伤财,结果落得全族被诛的下场。同样,羊舌鉶放纵刍蕘以“求货于卫”,受到叔向“渎货无厌,亦将及矣”^{[1]1354}的批评,后来他果真因贪墨好色获罪,被处死示众。郑国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1]1175},最终因“汰侈”而失政逃亡。楚灵王担任令尹时,便有杀人越货之举,及至篡位,更是兴修章华台、荒淫无度,与楚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1]1339}完全不同,故“不能自克,以及于难”^{[1]1341}。无论君或臣,追求美的享受而失于节制,都将陷入危险境地。

《左传》坚持节制欲望,认为美色有害。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景公病入膏肓,秦医和借“六气”和“五节”的原理,指出:“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

时,能无及此乎?”^{[1]1222}《左传》将因纵欲而败亡的主要责任归于女性,特别塑造了“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的夏姬形象。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楚庄王及其弟子反先后欲娶夏姬,被巫臣以“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是不祥人”^{[1]803}等理由阻止。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叔向欲娶夏姬的女儿,其母感叹:“甚美必有甚恶……而天钟美于是,必将以是大有败也……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1]1492-1493}《左传》中的审“美”活动,遵循相称、适度的原则,契合“礼”的秩序价值,不仅男性对于爱慕对象应避免“贪色过度”,而且女性选择配偶时亦能保持对于“美”的节制态度。徐吾犯之妹择偶,偏爱公孙楚戎服形象,拒绝公孙黑的“盛饰”之美,因为“夫夫妇妇,所谓顺也”^{[1]1212}。

除了物质节俭与生理审美内外相称的观念外,《左传》对待精神生活也遵循节制的观念。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王子颓叛乱之后,放纵淫泆,乐舞不倦,遭到郑、虢二国联军驱逐杀害。“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郑伯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1]214-215}郑厉公效尤王子颓,“乐及遍舞”,结果不久也死了。但乐舞风格本身是追求“节制”。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札在鲁观乐,叹乐舞之美后评价曰:“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1]1161-1165}季札强调了以适度为美的艺术评价标准。

礼乐是周文化的重要内容,但其内在精神却是节制美德。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郑国的公孙黑肱在病重后嘱托家臣和儿子“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

尽归其余邑”，具有敬戒而不贪的可贵品质，从而得到《左传》引《诗》“慎尔侯度，用戒不虞”^{[1]1068}的称赞。此外，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晋悼公“输积聚以贷……祈以币更，宾以特性，器用不作，车服从给”，不仅开源更重节流，使得百姓克勤克俭、社会秩序井然，于是“行之期年，国乃有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1]972}。“薄祭”符合《左传》对“美”的评判，比起表面的浮华，更注重内在的充实，亦不会被视作冒犯神明的行为。恰如臧哀伯谏鲁桓公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1]86-89}美在于真诚的德行，若仅仅强调“牲牷肥腯，粢盛丰备”^{[1]1011}的形式，就不能取信于神。“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1]229}这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原则，也是祭祀活动中礼乐的原则。

礼，时为大。春秋后期，政治家与哲学家都强调社会管理的制度建设。郑国良臣子产“不大宅域，不建台寢，不饰美车马衣裳”，又采取“铸刑书”“封田洫”等措施，宽猛相济地调和矛盾，推行节制，从而达到“张美弃恶”的效果，维护了社会秩序。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记录子产大力打击僭越性质的土地兼并行为：“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1]1181}三年后，百姓安心发展生产，广受文化教育，国家物质基础丰厚、政局稳定。《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将子产的成就概括为：“禁专擅、相冒、躡跞、饰美宫室衣裳、好饮食醕酿、以远眛者。”^{[2]418}可见子产以适度为原则，顺天应人，促使社会上形成了节制有序的风尚。

二、节制观念的形成与特征

郑康成《六艺论》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讞，穀梁善于经。”^[3]《左传》以重“礼”之说贯穿始终，其言“礼”者凡462次，另有“礼食”“礼书”“礼经”“礼秩”“礼义”之文。《左传》言“礼”，不仅记录礼仪现象，而且体现礼制观念——“礼”与节制的审美思想密切相关，这正是得益于周人对“殷礼”的改造。

“礼”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作“豈”。许慎《说文解字》：“豈，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后经学者考释，“豈”或“象二玉在器”，或为“壹”的增画，其形“出于祭祀时的击鼓演奏”，反映的是食物献祭、乐器演奏、玉币进奉等祭祀程序^[4]。在卜辞中，“巫”“舞”为同一字，所以殷商礼制，很可能源于祭祀歌舞这种特定的事神致福活动，具有“尚鬼”的宗教色彩。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5]813}“鬼”是先公先王的化身；“神”则是将自然人格化形成的“帝”，是信仰中“至上神”的概念。这句话中潜藏着与世俗对应的等级世界——帝廷，要求商王作为“一元多神”的代表，“率民”参与宗教活动，并在巫祝的帮助下，通过占卜祭祀的仪式与“宾于帝”的“鬼”沟通，进而取悦、祈祷于“上帝”。商人“尚鬼”不仅使宗教礼制呈现出庄严、神秘的特点，而且影响了当时的审美倾向，即工匠怀着恭敬、虔诚之心精进制造技艺，使得青铜礼器花纹日趋繁复。此外，青铜艺术因器尚象，以自然崇拜为指导思想，通过模仿动物造型沟通人神，不仅创造出庞大、严整的造型与精致的装饰，而且发展了前朝“兽面纹”等原始恐怖纹饰，以衬托王权威严来达到震慑效果的美感。殷商中后期，庄重雄浑、繁缛狞厉之美受到重视，有文胜其质的倾向。随着王权的加强，神权沦为王权工具。商朝末期商王已不常亲自参与祭祀活动，由此产生轻视神权麻痹民众的作用，导致统治合法性危机。这也使得审美活动在“重文”的基础上，向个体情感体验倾斜，最终导致过分浪漫的玄想以及耽于享乐、纵欲不节制观念的产生。

商王不加节制的审美主要体现在对待饮酒的态度上。《尚书·商书·微子》载微子言：“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6]199}父师亦曰：“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6]202}商纣王过度饮酒使朝政混乱、国家岌岌可危。西周大盂鼎铭文更是将商朝覆灭之因，直接归于殷族流行的酗酒风气，“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已”^{[6]170}，此记载可信。除了嗜

酒,后世还记载了商王族其他的失当之举。譬如殷人尚声,商族不仅有祭祀专用的、彰显狂热的宗教意识而不加节制的“巫乐”,还有供统治者纵情享受的“淫乐”。《韩非子》称“纣为靡靡之音”^[7],《史记·殷本纪》更作出“好酒淫乐,嬖于妇人”^[8]的总结。

周部落趁商纣王远征东夷,突袭成功。周初政治上有诸多不稳定因素,亟须稳定社会以巩固统治。以周公为代表的掌权者,一方面强调商纣王“荒淫”致其亡国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沿袭殷礼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在政治上确立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调“亲亲”“尊尊”的人伦道德与等级秩序;在宗教上“改帝称天”、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为周族统治寻求合法性。这些举措丰富了“礼”的精神,使得神本位的宗教文化开始向人本位的伦理文化转变。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9]周王朝吸取商王耽酒乱国的教训,试图拨乱反正,自然更主张节制适度的美德。《尚书·酒诰》记周公命令康叔封在卫国戒酒,追溯文王的教导:“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6]291}大盂鼎亦录周康王命辞:“在于御事,収(且)酒无敢酣。”^[10]周代统治者用道德约束自我,并且督促臣民适度饮酒,崇尚节制,符合“礼仪”精神,维护了社会稳定与和谐。

周人不仅在生活习惯上以节制为美,在祭祀时也注重节制,“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绣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稿棘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贵其质也。大圭不琢,美其质也。丹漆雕几之美,素车之乘,尊其朴也,贵其质而已矣。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同于所安亵之甚也。如是而后宜”^{[5]349}。周人祭祀用“玄酒”“明水”“疏布”“蒲越”,他们认为神明是质朴的,应该尊其本来面目,这与商人对神以多为贵不同。“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5]677}周人还通过控制祭祀的频率,时刻保持敬畏之心,风俗井然。

周代审美强调节制,这与适应礼的制度与秩序有密切关系。“礼”的秩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等级的区分,这在器用方面表现更加明

显。比如雅乐,“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1]46}。贵族官员需按规定欣赏乐舞,严禁逾矩滥用,其中也特别强调“节”的观念。作为统治阶级,君王、大臣保持有节制的生活方式,其主要目的在于以身作则、以俭矫世。郑国子产“宅大心张,美外态矜,乃自失。君子知惧乃忧,忧乃少忧。损难有事,多难近亡”^{[2]417}。子产担忧奢侈华丽的物质会使心性放纵、酿成祸患。晏子生活节俭,服饰粗劣,《晏子春秋》记载他常“衣缁布之衣”^{[11]405},“布衣鹿裘以朝”^{[11]515}。齐景公赏赐他狐之白裘、元豹之茈与千金之资,晏子辞而不受,“君就赐,使婴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婴服之于下,不可以为教”^{[11]513}。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认为他的房子“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1]1237},晏子也谢绝了。他认为:“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11]439}如果臣子和国君一样穿华美的衣服,享“辂车乘马”、高宅深院的待遇,则违反礼仪,晏子担心这样不能教化百姓,故而选择过一种节俭而守制的生活。

节制的美德以“礼”“德”作为标准,强调约束而非禁欲。《左传》强调“怀与安,实败名”^{[1]406},审美享乐的同时,需注意合度。唯有合度,才能达成“保民”与“修身”的终极目标。如果说《左传》多述节制行为的话,那么《周易·节卦》则比较完整地从理论上阐述节制观念,即节制可致亨通,但过分节制也不可以,应当持正、适中。卦中强调,应从实际出发选准限制点,才能保证节制的顺利可行。君子应当效法《节卦》的义理,制定典章制度和必要的礼仪法度来作为行事的准则,以此来节制人们的行为。其中《彖辞》云:“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颖达疏曰:“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时,不害民也。”^②

三、孔子对《左传》节制审美观的推动发展

孔子十分推崇以子产、晏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2]11-12},强调内外约束、节制审美的理论,很可能就是受到了子产、晏子等人的影响,或者至少说,这些先贤

因符合孔子的为政、审美准则，而被奉为榜样。譬如对于子产，孔子不仅赋予他“古之遗爱”“惠人”的美名，还将其树立为君子的典范，称赞他具备“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2]46}的风度。这种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左传》塑造了子产与晏子的形象，所以，子产以“仁”为主要特点，常常用节制有度的审美行为体现着“礼”的精神，表达着“保民”与“修身”的愿望；晏子的节制存富之语，也与“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12]35}的理论高度相似。

孔子自身的审美活动，始终围绕“克己复礼为仁”的“节制”原则展开，“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12]86}，麻为布、纯为丝。周人以麻冕为礼，但孔子并未选择继承前制，因为比起形式，“仁”所催生的“俭德”更接近礼之“义”（精神）。缁布冠细密难成，不如丝冕节省，孔子灵活变通“礼仪”，具备合理性。“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12]24}“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12]75}孔子并不支持极奢极俭的生活（极奢极俭都有过分而失礼的倾向），但对节俭的德行大体持赞成的态度，这是因为“俭”比“奢”更接近节制的平衡。由此便可以理解“食不厌精、脍不厌细”^{[12]101}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12]69}：前者讲究祭祀真诚，合礼之秩序；后者则通过节制的行为，达成“礼义”精神的丰盈。

孔子不仅倡导“俭德”，强调道德对美的关键作用，还提出君子“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12]207-208}，其评判标准恰当，契合“中庸”不偏不倚的原则。“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2]63}中庸是“德”之“至”，它源于“尚中”的理念。“中”的本义是“中旗”，即氏族社会的徽帜。随后，先民竖杆以观自然变化规律，提出北斗分野的理论，这是“立中”实践；统治者通过政治、军事行动“居中位”，又赋予“中”王权的象征意义；周代首领平天下、聚四方，不仅“居中而治”，还用人格精神“正”其位，故“中”“正”同义，一直发展到孔子时期，形成了“中庸”的思想。“中庸”引入礼乐活动，使得社会秩序分明、氛围融洽，便导向了“中和”的审美境界。

所谓“中和”，主要以“中”为尺度，以“和”为理想价值。“和”字始见于战国金文，指声音相应。《说文解字注》云：“经传多借和为龢。”^[13]而“龢”最初是殷商甲骨文，《说文》解作“调也”，指音乐和谐。“龢”“和”二者可能是古今字的关系，它们都与声、音、乐相关。“凡音者，生人心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乐者，通伦理者也。”^{[5]526-528}所以，“和”的美学特征是从音乐艺术中发展出来的，最初强调“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神人以和”，然后才是“管乎人情”的“礼乐之和”。

“礼乐之和”早在西周就已经出现，其可以被视为美学范畴“中和”形成的基础。周太史史伯有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4]此处区分了“和”与“同”：“和”是有秩序的协调，达成了“礼辨异”与“乐统同”的平衡；“同”则是无差别的叠加，难以显示出审美的趣味。所以，“礼乐之和”是更高明的境界。

现存典籍并未记录孔子对“中庸”概念的界定，更没有其对“中和”审美观念的讨论，但孔子的思想与行为无疑具有“礼乐中和”之特点。孔子尚“中”，即使他能够欣赏“狂”与“狷”的激进、孤洁，也是以“不得中行而与之”^{[12]139}作为先设语境。对此，孟子所言“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15]139}，可备为解释。《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记载孔子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1]1668}这里将“度礼中行”与“厚施行”“薄赋敛”结合，体现节制轻财、重礼保民的精神。孔子节制行为、中行合度的最终目的是达成“和”的理想：“礼之用，和为贵。”^{[12]7}“和”与“礼”互为体用、中正适度的秩序以及对和谐境界的追求统一，都是孔子“中和”的价值体现，阐明了圣人所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和谐之美。

孔子试图对艺术进行“中”的规范，提倡通过美育达到社会和谐的终极之美。所以“中和”作为审美标准，常常被反映于“节情适度”“尽善尽美”“文质中道（彬彬）”等诸多美学命题或审美评价之中。比如“节情适度”是对主体的要求：在进行艺术创作或表演时，应“乐而不淫，哀

而不伤”，否则就违背了审美情感的规律。而“尽善尽美”是对审美客体的高度评价：“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2]33}孔子并不否认形式的动人、声音的悦耳，但他也注重内容，要求它们是节制、平和、仁义的，即孟子后来所明确的“充实之谓美”。善作为美之重要标准，有时甚至能影响形式的表达，即“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2]24}。礼、乐之美，如果只看重“玉帛”“钟鼓”，其形式魅力将不值一提。孔子将作为道德内容的“善”与外在形式的“美”结合，强调美善合一、美善平衡，为中国美学的提升作出了重要的尝试，是对“中和”审美的发展。

“美”与“善”的“中和”，引申到人格领域即“文质中道(彬彬)”。孔子以射喻道，其道为中为正。“文犹质，质犹文”^{[12]124}，君子修饰文采又言辞雅洁，品行端正且道德高尚，合中合礼、达到“彬彬”的适度与平衡，具有温柔敦厚的特质。孔子以圣人为理想，强调“君子”，将人格纳入审美领域。《左传》中记录众多孔子的评语，比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1106}，“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1]1601}，“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1]1239}，“能补过者，君子也”^{[1]1296}等，均体现了“文质中道(彬彬)”的人格审美倾向。

由此可见，孔子“礼乐中和”的审美观念，对《左传》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左传》除了对孔子语言进行了保存，还记载了其他人物的“中和”思想：季札的“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1]1164}；晏子提出“和同之辩”，反对“以水济水”“琴瑟专一”的同，提倡“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1]1420}。一方面，从身份来看，这些人物都是孔子尊崇的“师长”，他们活动的时期往往早于孔子。另一方面，考虑到《左传》的成书年代，孔子的态度及其美学思想，也可能影响了《左传》对于节制美学事件的选择、记录。毕竟后期儒家美学思想壮大，一度成为中国美学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如子思完成《中庸》，明确了“中庸”“中和”的内涵，赋予其形而上的哲学形式，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5]773}，“中和”是根本法则，与宇宙相联系，彰显“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境界。与此同时，“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

皆中节谓之和”^{[5]773}，具有正心诚意的意味，子思指出礼之外“致中和”的另一重保障，即保持内心中正、抒发情感节制，讲究“慎独”。除子思以外，孟子、荀子二人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不仅发展出“充实之为美”的理论，还继孔子以礼制中、由仁义行，丰富了权变时“中”的精神：“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15]289}孟子主张在行动中履“礼”不刻板、权衡情势利弊，受“礼”节制又节制“礼”。荀子作《乐论》，以乐从和、隆礼重法，并提出“和而不流”作为君子人格之美，这亦是对孔子节制审美意识的延伸。

总而言之，周代的审美意识经孔子的整合，形成了系统的美学理论。他在礼仪“节制”的基础上，更强调主体的内在修养与自我约束，这推动了以《左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审美观发展，影响了后世儒家美学的准则。

结 语

王国维在一百多年前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6]后来学者继续沿着这一思路不断探索，已有不少成果。但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内容来看待这一变革的话，生活观念的改变可能比政治与文化的变化还要剧烈。“从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殷代西周的青铜器中，大量的是饮食之器……在殷代，盛行着两股风，一是巫风，一是吃喝风。”^[17]同时，美味和美声、美色都成为享乐的内容。周初文告中提到了“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6]340}，到春秋时期，战乱纷争，一些思想家看到了极度奢侈带来的危害，所以提出适度的原则。《左传》中的审美现象体现在日常起居、婚丧嫁娶、乐舞祭祀等诸多方面，“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忌，不思謗讟，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1]1416}。其中以“德”“礼”为标准、以“保民”“修身”为目标，具有节制的特点。这种节制的思想是周人吸取殷商因淫侈耽酒而亡国的教训，并进一步改造礼制的结果，“礼”开始体现等级秩序与和谐境界，这与节制的审美意识相关。然而，审美意识不同

于审美观念,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节制的审美观念才经孔子继承而定型。事实上,孔子的贡献不仅在于继承了前代的礼制秩序思想与节制审美倾向,还在于他加强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创造性地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美善合一”等理论,这使得《左传》节制的审美观念更加丰富,也为儒家追求和谐适度、重视人格魅力的审美倾向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谭家健的《〈左传〉的美学思想》(《文学遗产》2010年第3期),从“乐舞”“器物”“人品”“言辞”四个方面探讨了《左传》的美学特点。周淑舫的《中国古典女性性别美感的文学书写——从〈左传〉女性之美的叙事谈起》(《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1期)、查清兰的《从〈左传〉看春秋时期外交辞令的含蓄美》(《兰台世界》2009年第8期)都是从审美现象与行为入手,都没有揭示审美特性与内在精神。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页。

参考文献

-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M].上海:中西书局,2017.
- [3]春秋穀梁传注疏[M].范宁,注.杨士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
- [4]王晓俊.“豐”之字形出于祭祀之“壹”:“礼”自“乐”出考论之一[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4):48–55.
- [5]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6]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63.
-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05.
- [9]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453.
- [10]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70.
- [11]晏子春秋[M].汤化,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3]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5.
- [14]左丘明.国语[M].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38–339.
- [1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6]王国维.观堂集林:2[M].北京:中华书局,1959:302.
- [17]于民.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0.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straint Concept and the Evolution of Aesthetic Awareness in the Zuo Zhuan

Guo Yuanlin

Abstract: Among the classics, the *Zuo Zhuan* is the most extensive. In the pas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Zuo Zhuan* has focused primarily on verifying historical facts, analyzing its property system and exploring the ritualistic ideas it reflects. However, as a work of social history, it must reflect the ideological concepts of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Looking through the complex historical facts, we can clearly find the concept of “restraint” life advocated in the *Zuo Zhuan*,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daily living, including wedding, funeral, music, dance sacrific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of the *Zuo Zhuan*, the frugal lifestyle of politicians provided a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 Conversely, an unrestrained lifestyle, one that is inconsistent with external things and identity, posed harm to the country. The modest conception of life in the *Zuo Zhuan* reflects not only historical ideas but also the necessary adaptations made in response to rapidly changing social conditions, which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precepts of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needs. The restraint concept was promoted by Confucius. Later, many aesthetic propositions such as “to restrain yourself and practice propriety is benevolence”, “unity of beauty and kindness”, “gentleness and refinement” and “the balanced harmony of Li and Yue” have been developed, which have laid the principles of Confucian aesthetics in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Zuo Zhuan*; the concept of “restraint” life; etiquette thought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esthetics

[责任编辑/周舟]